现代化之浴血：十二月党人的理论与实践

□张建华

“1812年的产儿”

1825年12月14日，在俄国的两大首都彼得堡和莫斯科以及南方的一些省份发生了一起声势浩大的以近卫军军官为主体的起义，起义的斗争目标是试图推翻沙皇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权体制和国家体制，这些起义者被称为十二月党人。

十二月党人大多数出身于贵族家庭并且在沙皇统治机构中担任一定的官职，但是他们并不愿意沉溺于贵族阶级醉生梦死的生活，盲目地为沙皇专制统治尽忠尽德，他们从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努力探寻俄国社会的出路。他们从少年时代起大多接触过西方的文化和教育，有些人在学校读书时便开始钻研西方特别是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著作，这些著作多半出自伏尔泰、卢梭、马布里等人手笔。这些勤于思考的青年贵族军官在莫斯科大学和军官学校读书时就已经广泛阅读了拉吉舍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在1812年抗击拿破仑大军入侵俄国的战争中，他们曾经响应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号召英勇地进行战斗，直至把法国军队赶出俄国领土。在俄国军队远征西欧的过程中，所到之处大多已经进行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诞生了“自由”“民主”和“平等”思想的土地上，他们真正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感受了人类的尊严。他们便不由自主地将黑暗的俄国与自由的法国进行了比较，他们在现实面前感到困惑，他们感受到“不仅在俄国，在所有欧洲国家，都感到失望和受骗了”，感到自己为保卫祖国曾不惜流血牺牲，但“难道我们解放欧洲就是为了把锁链套在我们身上吗？难道我们给了法国一部宪法，反而自己不敢讨论它吗？难道我们用血汗换来的国际地位就是为了在国内让人们受侮辱吗？”十二月党人领袖彼斯特尔早年曾经主张在俄国实施君主立宪改革，法国之行结束后，他表示：“我在心里变成了共和主义者，并且认识到任何统治形式也不会像共和主义统治形式那样，给俄国带来更大的幸福及更大的安乐。”他认为：“我从君主立宪思想方式转变为革命的思想方式，最主要的是由于下列论题和见解的影响，——德杜—德—特拉西的法文著作对我发生很强烈的影响。”因此，十二月党人自称是“1812年的产儿”，他们在民主思想的指引下，坚定地走上了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道路。

“政府属于人民，它为给人民谋幸福而成立”

1821年在彼得堡成立了一个秘密团体——北方协会，它的领导人是尼基塔·穆拉维约夫，北方协会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实行君主立宪，它主要体现在由穆拉维约夫起草的宪法草案中。

同年在乌克兰成立的南方协会是十二月党人最有影响的秘密团体，它的领导人是彼斯特尔，这个团体的政治主张是彻底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实行共和制。1824年，南方协会通过了由彼斯特尔起草的《俄罗斯法典》（又名《伟大的俄罗斯人民不可侵犯的国家证书，它是改善俄国政体的约法，是交给人民和临时最高权力机关的信守不渝的委托书》），这是一部革命纲领，也是俄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这部宪法是以法国1793年宪法和土地纲领为蓝本，集中地反映了十二月党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主张。按照彼斯特尔的设想：“《俄罗斯法典》是给临时最高政权机关的委托书或者说指令，同时又是给人民的告示：他们将得到哪些自由和可以重新获得哪些权利……《俄罗斯法典》规定了最高政权机关的义务，并且是对俄罗斯的一份保证书，保证临时政权机关将一心一意地为祖国的利益而工作。”

《俄罗斯法典》宣布农奴制度是一种野蛮的生产方式，因为“把别人当作自己私有财产，把人当作东西一样转让、抵押、赠送和继承，任凭自己的专横无道……乃是最可耻的、违背人性和自然规律，以及违背神圣的基督教义，并且还是违背天神的诫条与意志的丑恶事情”，“必须坚持废除奴隶制度，贵族必须永远放弃占有他人的卑鄙的优越地位。”因此“消灭奴隶制度和农奴状态是临时最高政权机关最神圣和义不容辞的义务”，谁阻挠废除农奴制，谁就是“祖国的敌人”和“叛徒”。农民应该在取得人身自由的同时得到他们生活所必需的土地，使“他们将确信，在自己乡里随时能找到一块土地来养活自己。他可以从这块土地上得到食物，不靠别人的施舍，也不再依附于他人，而是靠耕耘所付出的劳动过活，他本人作为乡的一员和其他公民是平等的。”

《俄罗斯法典》宣布人人生来是平等的，“一切人都是为追求幸福而生，人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那种只把贵族等级的人物称为高贵，而称其他等级人下贱的行为是极不公正的。”因此必须废除封建等级制度，废除贵族阶级所享有的特权，使所有的俄罗斯人都成为“高贵的人”，建立一个“统一的公民等级”，凡年满20岁的成年男子都拥有选举权，选举权不受财产和教育资格的限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拥有自由择业权、迁徙权、言论和出版自由以及宗教信仰自由。《俄罗斯法典》对未来的新政权提出了要求，它应该保证每个人的人身公民权，因为“人身自由是每个公民首要的权利，是每个政府最神圣的职责。国家大厦的整个建筑以此为基础，没有人身自由，就没有安宁，就没有幸福。”

未来的国家政体将采取资产阶级共和制，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为一院制的人民议会，人民议会的选举分两级进行。国家的最高行政权力交给由5人组成的最高杜马，其成员由人民议会选出，并且向人民议会负责，任期为5年。中央监察机关为最高会议，其职责是监督宪法和其他立法的执行情况，由120个人组成。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应该选举产生，任何国家立法和行政机构应该服务于人民，人民有权推翻不称职的政府和领导人，因为“俄国人民不是属于某一个人或者某一家族的。恰恰相反，政府属于人民，它为给人民谋幸福而成立，人民不是为给政府谋幸福而生存的。”

列宁把十二月党人称为“贵族革命家”

1825年11月19日（公历12月1日），在南方塔甘罗格军港检阅军队的亚历山大一世突然病逝，8天后这个消息传到彼得堡，宫廷内部出现了一片混乱。按照皇统世系，亚历山大一世去世后，皇位应该由他的大弟弟康斯坦丁继承，但康斯坦丁因为同一个与皇族没有血缘关系的波兰女子结婚，已宣布放弃皇位。亚历山大一世生前指定了第二个弟弟尼古拉为皇位继承人。但有关的诏书在亚历山大一世生前并未公布，而是密藏于东正教教会、枢密院和国务会议。因此出现了尼古拉向远在华沙的哥哥康斯坦丁效忠，而康斯坦丁坚决拒绝皇位，并根据亚历山大一世的密诏向在彼得堡的弟弟尼古拉效忠的场面。因华沙与彼得堡相距遥远，往返书信无法及时送达，因此在俄国形成了十余天皇统中断的混乱局面。

十二月党人决定利用这样一种特殊的形势，赶在皇位继承人尼古拉举行再宣誓继位的12月14日（公历12月26日）前发动军事行动，迫使新沙皇和枢密院宣布改制。他们选举了近卫军团长特鲁别茨科依担任起义军总指挥，并且拟定了《告俄国人民宣言》，宣布推翻沙皇政府，立即召开立宪会议，成立临时政府，同时宣布废除农奴制，解放全国农奴。

12月14日晨，由十二月党人军官带领的近卫军团体按照计划开进彼得堡的枢密院广场，在彼得一世的纪念像下近卫军排列好战斗方阵，到下午起义军人数增至3000余人，周围还有2万余名拥护起义的老百姓。然而尼古拉一世早有防备，他在12月14日凌晨就紧急召开国务会议宣布继位，又命令枢密院议员向他们举行效忠宣誓。然后又派出大量的军队将枢密院广场层层包围，这时原定担任起义军总指挥的特鲁别茨科依临阵脱逃而不见踪影，起义军和周围的老百姓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因而延误了战机，而便于尼古拉一世调兵来镇压。在尼古拉一世数次下令开炮之后，广场上响起了激烈的炮声、枪声、人喊和马嘶声，起义最终被镇压，被打死的起义军官兵和老百姓共计1271人。

起义失败后，沙皇政府成立了“秘密审讯委员会”，对参加起义的人进行审判。十二月党人领袖彼斯特尔、雷列耶夫、卡霍夫斯基、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别斯图热夫—柳明以特等罪被处以极刑。有数千名起义参加者被处以重刑，有121人被流放到人烟稀少、寒冷荒芜的西伯利亚服苦役，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自愿抛弃优越富足的贵族生活，离开大都市，选择跟随自己的丈夫的长期流放的生活。

十二月党人起义是俄国历史上对沙皇专制制度的一次巨大的冲击，它不同以往的以农民起义为主体的革命，十二月党人无论是在文化教育水平、政治素养和远见、政治斗争手段、组织能力等方面均远远胜于前者。列宁把十二月党人称为“贵族革命家”、“贵族中的优秀人物帮助唤醒了人民”，并且把这一时期称为贵族革命时期。

十二月党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不仅专注于理论建设和舆论宣传，而且更致力于革命实践。他们彻底地背叛了他们所出身的那个阶级，背叛了他们曾经捍卫的那个制度，自觉地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自己联结在一起，不怕流血牺牲，英勇地发起了向俄国专制制度的第一次冲击，推进了俄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

Civilization 西方文明历程

破解俄国现代化之谜

反陋习的坎坷

□刘志琴

鸦片战争后，强烈的救亡意识促使人们反思战争失利，维新夭折之由。梁启超认为“中国所以不能维新之大原”，是在于“国民衰败堕落”，要“新国”必“新民”，首先除去“心中的奴隶”，严复在《救亡决论》中呼吁：“无变今之俗，欲求不亡之必无幸矣！”他们都把扫除陋习作为救亡爱国的行动。辛亥革命又把移风易俗推向新的高潮，究竟是什么样的恶风陋习促使一代又一代的先进中国人为扫除积弊而奋斗不息？

在一百多年前，男子脑后拖辫子，女的缠小脚，是最有损中国人形象的两大陋俗。其中尤以缠足给妇女带来的痛苦为甚，在世界上也属罕有。所谓“小脚一双，眼泪一缸”，真切地反映了女性受到的摧残。这种陋俗，并非没有人抨击，早在宋代车若水就指出，妇女自幼“无罪无辜，而使之受无限之苦，缠得小来，不使何用？”清代张宗法痛斥缠足之害说：“今俗尚缠足，堪伤天地之本元，自害人生之德流，而后世不福不寿，皆因先天有戕，此语可为智者道也。”

要知道缠足并非是华夏的古风，更不是满人的风俗。清朝以马上得天下，满族妇女都崇尚大脚，清初几度颁布禁止缠足的法令，抗旨者其父或夫要受杖刑和流放。然而这并没有遏制这一陋习，不得不弛禁。

为什么历代文人的抨击，清初的严刑峻法，对此都无可奈何？男尊女卑的社会机制，视女性为玩物的男权思想，依附男性的女子心理，都助长了这一恶习的流布。

自古以来虽然并不乏有为女性痛苦呐喊的有识者，但更多的文人雅士、骚人墨客却对女子缠足赞誉有加，不惜为文揄扬，赞美小脚是中华文化的“巧思”，甚至用女人的小脚鞋盛酒痛饮，以为风雅。

这缠足危害之大，不仅损害了二亿女子，近全国一半人口的健康和女性的解放，也不利于子孙后代的发育成长。使中国人蒙羞的“东亚病夫”，社会的积贫积弱，莫不与缠足有关。要求变革的仁人志士，莫不对这恶极无量的丑行口诛笔伐。

清初的旋禁旋弛说明，改良习俗如果没有社会变革的支持，就事论事，免不了要被旧习惯势力所吞没。到清末，维新变革已蔚为思潮，反对缠足又得以避开满汉的民族矛盾，因而受到当政者的支持。光绪三十年颁布《劝行放足歌》的诏书，歌词琅琅上口：“照得女子缠足，最为中华恶俗。”“惟当缠足之时，任其日夜号哭。对面置若罔闻。女亦甘受其酷！为之推原其故，不过扭于世俗。”然而面对这已流传近千年的旧习，即便有了最高指令，也遭遇陈腐观念的顽强抵制。19世纪末苏州成立不缠足会进行劝导工作时，弄得“舌敝唇焦”，20世纪初绥远的天足劝导员“游说期年，听者藐藐”。

习俗相沿是最顽强的惰性力量，它沉潜在民族心理深处，不问是非善恶，潜滋暗长，形成无形的网罗，这是社会变革中最容易出现反复的领域，非有极大的宣传攻势和社会保障，形成强大的冲击力，无以一扫积弊，民国政府为此作了最大的努力。辛亥起义后的第9天，湖北军政府即发布放足通告，各地纷纷呼应，凡有成人教育的场所如书社、茶园、读报社、讲演堂，都配合进行宣传，加大力度口诛笔伐这种摧筋折骨的陋习。《妇女杂志》号召女性“痛自猛省，革千年之毒，复本来之天。”以放足作为“独立之起点，强种之根源。”增强女性的自强和爱国意识。同时对放足者实行奖励，以实际行动冲破习惯势力的阻挠。《天足会报》、《天足日报》、《天足公平报》等专刊联翩发行。戒缠足的歌谣、弹词、小说、漫画纷纷出台，广为传布。为了解除女子放足，出嫁困难的顾虑，有的天足会提倡入会者的子女互相婚配，蔡元培更以不缠足作为征婚的第一条件，一批批民众喜闻乐见的歌谣、说唱、戏剧，活跃在舞台，普及到家家户户。在上海推崇天足成为新时尚，《海上竹枝词》就有这样的诗句：“学界开通到女流，金丝眼镜自由头。皮鞋黑袜天然足，笑彼金莲最可羞。”泰山东岳庙，供奉的娘娘，泥塑金身，三寸金莲，朝拜者纷纷用大脚鞋献给女菩萨换装。“以娘娘实行放足，普告钳制之妇女。”可见放足的宣传已经深入人心。天足女郎成为时髦女性的美称，风行一时。

民国初年之所以能取得这样大的成效，是历经维新、新政、革命运动坚持不懈地除旧布新，广泛传播文明生活观念的结果，但在农村却不尽人意，有的还出现死角，1929年3月19日的《申报》报道山东滕县红枪会变乱，甚至提出“放任妇女缠足”的口号。1933年据山西省统计，全省15岁以下的女孩缠足的还有32万2千余人，致使这一陋习迟迟不能绝迹。20世纪90年代，报告文学《中国最后的小脚部落》揭示，云南通海县的六一村，至今还有300多位缠足的老太太，现今70岁的老人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才放足。

风俗新论[9]

漫话国子监

□邸永君

自元代至清代，国子监曾是国家最高学府。因遍布于全国各地的府州县各级官学亦归其统领，故而它也是国家最高教育管理机构。其衙址在今北京内城北部的成贤街，与孔庙相邻，始建于元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距今已逾七百年之久。当今所存之建筑和规制形成于明代永乐时。明洪武时，太祖于南京建国子监。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即仿建之，而规模有所缩减。时至清代，又在原有基础上辄有增益。尤其是乾隆时期，高宗颇好风雅，标榜文治，曾大兴土木，使之焕然一新。清亡，国子监废，几百年之辉煌竟成故事。如今，徜徉于雕栏玉砌之间，古木枯藤之下，思古之幽情不禁油然而生。

元代国子监之遗迹，已无从细考。其遗物只有古树二株：槐一、柏一。一棵立于大成殿阶下，一棵立于彝伦堂前，据传皆为元代首任国子监祭酒（相当于校长兼教育部长）许衡亲手所植。柏树至今老当益壮，活力不减，“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数百年来历经沧桑仍傲骨犹存；而那棵槐树却已老态龙钟，枝细叶疏，生气全无，正可谓虽生犹死者也。据传说清代时，此树就已经“死”过一次，休眠达几十年，然不知是何原因，乾隆时又死而复生。偏巧正逢慈宁太后的六十“万寿”，朝野引为大吉大利之兆，于是上至高宗、下至词臣纷纷吟诗作赋，还特为老槐画影图形，并泐石立碑以记之，碑至今犹存。

国子监之正门曰集贤门，为一黄色琉璃牌楼。牌楼之北，一座庄严而又美丽的建筑便展现于眼前，此即大名鼎鼎之“辟雍”是也，乃乾隆时所创建，是为国子监之核心建筑，地位颇为突出。辟雍乃古代天子讲学之所，然究竟是何等模样，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周围必有一水环绕，此水名泮水也，即萦绕辟雍之正圆形水池。而当中为一四方形陆地，取“天圆地方”之意也。上面矗立着一座宏大的四方形大殿，重檐，有廊柱两层，覆以黄色琉璃瓦，最高处为一巨大的镏金顶，雕梁画栋，富丽堂皇，给人以气度非凡之感，即为辟雍殿。其四面均有门，皆可洞启，并能通过四座石桥，跨越泮水，出入极为畅达。泮水周围及石桥两侧皆有汉白玉栏杆，至为精美。考仿建辟雍之议，由来久矣，但至乾隆以前，皆因为无法解决通水问题而作罢。而辟雍必有泮水，不然则不伦不类。乾隆毕竟是有为之君，下令打井四眼，再从井中汲水，通过四个龙头（螭首），自暗道注入，喷至白石砌就之泮水池中，于是问题迎刃而解。泮水池中波光潋滟，辟雍阶前苍苔点点，诚赏心悦目之景致。自此以后，每逢二、八月祀孔释奠之后，乾隆便乘兴而来，伴着齐鸣之钟鼓，穿过缭绕之香烟，跨过泮水，步入辟雍，南面而坐，亲自主讲《大学》或《孝经》一章，而王公大臣与国子监生听圣谕于阶下，是为天子“临雍”之典。其实，讲经纯属形式，而过一过古代天子播慧于天下之雅瘾，才是乾隆不惜口干舌燥的真正原因之所在。嘉庆、道光年间，此戏亦曾上演。而至光绪时，国事日非，清廷摇摇欲坠，断无暇再尽如此兴师动众之雅兴。泮水干涸见底，辟雍尘封逾寸，预示着大清朝离土崩瓦解殆不远矣。

辟雍之后为彝伦堂，乃祭酒和司业（相当于当今之教务长）办公之处所。另外，还有“四厅六堂”，四厅者，教习（即教授、讲师）之办公处；六堂者，监生之教室也。因清朝时另于国子监斜对门处另建有房舍，以供国子监生研修住宿之用，时称“南学”　故而六堂多作为考场之场所。月考、季考皆在此举行，诚“料得年年肠断处”是也。

六堂之中原曾陈列着石刻《十三经》一套，此“书”



每页宽三尺余，长七尺许，厚约一尺，其重量可想而知。据传乃乾隆时由老书生名蒋衡者默写而成，并献与朝廷。高宗受之，命刻于石上，存于国子监中，以昭示大清文风之盛。似可认定此书之重量乃世界之最。国子监碑刻亦因蒋衡所写之经而数量宏大。另有著名石刻如赵松雪临写之《黄庭经》　《兰亭序》；颜鲁公之《争座位》等为之增色。流连其中，可深深感受到中华文化底蕴之厚重。但众碑中亦有与斯文极不相谐者：明初，太祖为培养人才，对国子监十分重视，首任国子监祭酒宗讷秉承其意旨，制订规条多种，待学生残酷非常，学生多有不堪忍受，以致有饿死吊死者。为此，国子监生曾两次集体抗议，即当今所谓“学潮”。第二次学潮起事者赵麟，以年轻气盛，曾张出壁报一张，尽数祭酒所定条规之弊。太祖闻之，以赵麟欲聚众谋反，立诛之，并于国子监立一长竿，枭赵麟首级悬于其上，学潮即平。从此出现安定团结之大好局面。十年后，太祖故事重提，召集国子监全体师生训话，其语“谆谆”，用心良苦，并刻碑记之。永乐迁都后，将此碑奉迎至此。至今似乎仍可令手无缚鸡之力之学子感受到杀气与血腥。

国子监虽号称国家最高学府，然在科举时代，其毕业生地位却相对较低。其学生来源主要是全国各府州县按名额贡入之生员，有岁贡、优贡、拔贡、恩贡、副贡等名目，号“五贡”。他们只有生员（即秀才）的功名，若想再进一步，仍须参加乡试。唯一的照顾便是无论国子监生之籍贯，皆可应试于顺天府（大致相当于今北京市）。若不再考取功名，以国子监生身份入仕，则多被用做县丞（副县长），或教谕、训导等学官，秩低而俸薄，权轻而利小。因此，学生学习积极性一直不高，学校课业也就相对宽松懈怠。加之封建时代教学方式之陈旧落后，教学内容之枯燥贫乏，使得学生主要的功课便是背书、写字、作文。“青春作赋，皓首穷经”　即是对此辈的生动写照。

国子监监生身份向不为世人所重，而自明朝景泰皇帝开生员纳粟纳马入监（即例贡）之例之后，国子监门槛愈低。尔后捐监之风大开，监生以钱铺路，良莠不齐，益为世人所轻。

光绪三十年（1904），清廷下诏，于明年永停科举，各级学校皆改办新式学堂。而或许是历史惯性之原因，国子监仍得以苟延残喘。1912年，清廷退位，国子监亦寿终正寝。

民国元年（1912），政府在国子监成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1957年，首都图书馆迁入。这集中体现出国人热衷于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利用，但同时亦反映出那个时代文物保护意识的淡薄。所幸者，该建筑群保存基本完好。近年来，文物之地位飙升，国子监古建筑群越来越被各界所关注。2001年首都图书馆新馆落成并投入使用，因此，国子监必将得到应有的呵护，从而真正体现其珍贵的历史价值。

China 中华春秋

“我来剑桥，是为了求学问，不是为了得学位的。

小杂货店里的大数学家

□巫唐

1930年的一天，江苏金坛的一个小杂货店里，一个记账员模样的青年在昏暗的油灯下激动地打开上海寄来的新一期《科学》杂志，看到了发表在上面的那篇题为《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的论文，也看到了印在上面的自己的名字——华罗庚。他还没想到，他第一次发表的论文，会对他的命运产生何等重要的影响。

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也注意到了这篇文章，很是欣赏，但他和同事都不知道这个华罗庚是何方神圣，经多方打听，才知道是一位只念过初中的失学青年。熊庆来惊奇不已，随即做出决定：“这个年轻人应该请他到清华来！”

就这样，华罗庚于1931年来到了北京。接站的人发现，这个20出头的青年左腿有残疾——那是两年前严重的伤寒病带给他的。

华罗庚生于1910年，父亲是个小杂货店主。他刚生下来就用两个箩筐一扣，取义“落地生根”，容易养活，“罗庚”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因为家庭贫困，初中毕业后他到上海中华职业中学读书，但仍然交不起饭费，只好退学回乡，在父亲店里帮忙。

他的初中老师王维克出任金坛县初级中学的校长，聘他到学校当会计兼庶务。后来还让他兼做数学教员。不久竟有人向教育局告状，说校长“任用私人不合格教员华罗庚”，王校长愤然辞职，华罗庚的教员自然做不成了。好在还能继续做会计。他白天勤奋工作，晚上沉迷于数学世界，决心用“健全的头脑，代替不健全的双腿”，而当时他可以借到的，不过是《大代数》、《解析几何》和一本只有50页的《微积分》而已。但就是这点儿有限的数学书籍，奠定了一位大数学家的基础。

来到清华后，华罗庚被安排做数学系的助理员。清华的学习、研究环境使他如鱼得水，学习愈加勤奋，才华得以发挥。他只用了一年半就攻下了数学系的全部课程，还自学了英、德、法文。华罗庚以自己的勤奋、才华和学术成就，赢得了师生们的尊敬。1935年，教授会一致通过他升任助教，以初中学历而登上大学讲坛，破了清华的先例。据另一位大数学家陈省身回忆，那时清华数学系最引人注意的人物就是华罗庚，他几乎成了数学系的中心。熊庆来碰上难解的题目时，往往朝着隔壁喊：“华先生，你来一下，看看这个题怎样解……”再一年半，华罗庚又被提升为讲师。到1936年，他已先后在欧美、日本等国数学杂志上发表了十几篇有关数论方面的论文。

1936年，华罗庚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深造。他没有选择攻读博士学位，而是选择做访问学者：因为做访问者可以同时攻读七、八门学科。他说：“我来剑桥，是为了求学问，不是为了得学位的。”在剑桥的两年，他没有拿到博士学位，但是他写出了近20篇论文，令数学界同行们刮目相看。其中一篇关于“塔内问题”的研究，他提出的关于完整三角和的理论被数学界称为“华氏定理”。他的导师哈代是这方面的权威学者，听到这个消息，说：“太好了，我的著作把它写成是无法改进的，这回我的著作非改不可了！”

而他拥有的唯一的一张文凭，仍然是他的金坛中学初中毕业文凭。

1938年华罗庚谢绝了访问苏联和继续留在海外学习的邀请，返回了正处于抗战中的祖国，被聘为西南联大教授。在昆明艰苦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下坚持研究，写出了20多篇论文，并于1941年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名著《堆垒素数论》。这部专著发表数十年后仍居世界领先地位，成为20世纪数论著作的经典。

1946年，华罗庚应邀到美国伊利诺大学任教，被聘为终身教授。1950年，他又毅然放弃在美国的优厚待遇，回国工作，途经香港时，他写下了《致留美学生的公开信》，呼吁留学生们回国参加建设。在回国后长达30多年的岁月里，他历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大副校长、中科院副院长等职，从未放弃研究，在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多复变函数论等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其《数论导引》、《典型域上的调和分析》、《典型群》（和万哲先合著）等著作享有国际声誉。作为一位著名的数学家，他还十分重视把数学理论研究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出版了《统筹方法平话》、《优选学》等著作，并亲自组织和推广“优选法”、“统筹法”，在发展数学教育和科学普及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5年6月12日下午，华罗庚在东京大学报告厅做学术演讲，然而就在演讲结束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之际，他倒在了讲坛上，这让人想起他曾说过的：“最大希望就是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们在缅怀这样一位数学宗师时，也要感谢那些把这位初中生引领进清华园的人们。

Luminary 人物志